

古代诗词典藏本

袁行霈题

主 编 袁行霈

副主编 刘跃进

辛弃疾词选

王兆鹏 ◆ 撰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古代诗词典藏本

袁行霈题

主 编 袁行霈

副主编 刘跃进

王兆鹏◆撰

辛弃疾词选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辛弃疾词选/王兆鹏撰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7

(古代诗词典藏本)

ISBN 978-7-100-14070-6

I. ①辛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宋词—选集
IV. ①I222.8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32680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辛 弃 疾 词 选

(古代诗词典藏本)

王兆鹏 撰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

ISBN 978-7-100-14070-6

2017年7月第1版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201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10³/₄

定价:35.00元

古代诗词典藏本

主 编 袁行霈

副主编 刘跃进

编 委 (按姓氏音序排列)

曹 旭 陈祖美 程章灿 过常宝 蒋 寅

刘 石 刘扬忠 莫砺锋 钱志熙 王兆鹏

钟振振 周洪波 左东岭

策 划 厚艳芬

走出学术象牙塔

刘跃进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相比较而言，我们在普及工作方面做得还很不够。尽管各类选注本层出不穷，但精品甚少。很多学者不屑于做普及工作，认为体现不出研究水平；即便有水平的人去做，也很难得到同行认可。这样一种偏见，必须改变。

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，真正在学术史上确立地位的学者，都与其尽心致力于学术普及工作密切相关。汉代对于经典的注释、唐代对于古注的疏证以及清代乾嘉诸老对于历代经典的重新阐释，其出发点多是普及经典知识。现代学术研究又何尝不该如此？即以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例，六十多年前刚刚筹划建立文学所的时候，最初的工作主要就是选注历代文学经典作品。近来翻阅《王伯祥日记》，里面详细记载了郑振铎、何其芳等人如何精心策划《诗经选》《史记选》《汉魏六朝诗选》《三曹诗选》《唐诗选》《宋诗选注》的工作，印象深刻。每一部书的编纂，从篇目的确定，到注释的推敲，都经过反复打磨。然后内部油印，送到国内相关研究单位、高等院校，广泛征求学术界同行的意见。经过这样几个回合，才最后定稿，公开出版。这样的书，阐释经典，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经典，多数印行在数

十万册以上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。而这些作者的名字和声誉，也逐渐走出学术圈，为广大读者所熟知。前辈学者的工作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。

启示之一，我们必须对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有一种正确的认识。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，说易行难。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明确指出：“人民要求普及，跟着也就要求提高，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。在这里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，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。而这种提高，不是从空中提高，不是关门提高，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。这种提高，为普及所决定，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。”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，首先就是要做好普及工作。没有普及，何来提高？但提高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地普及。现在，不少学者宁愿躲进象牙塔中做专精研究，也不愿意做点文化普及工作。这种观念值得商榷。毫无疑问，专精研究当然应当鼓励，给予尊重，这个社会也确实需要一批很专精的研究者，去做专业性很强的研究，尽管这种研究可能对社会现实没有直接作用，但是对我们整个文化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。这道理不言自明。但同时，我们更需要一批人出来宣讲传统文化，让专家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为大众所认知。学术工作者来自人民群众，学术研究的本质也要求必须关注社会、依靠群众。如果我们的学术脱离人民群众，那就成了无根之木，难免凋零枯索的命运。这道理不言而喻。

启示之二，做好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，首先要求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。康德《逻辑学讲义·导论》说过：“学术的讲述是通俗讲述的基础。因为只有能够彻底讲述某物的

人，才能以通俗的方式讲述它。”这段话把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讲得非常明白。提高在前，普及在后。普及不是随意发挥，一定是在提高基础上的普及才有价值。真正的普及工作者或者说一个好的普及工作者，必须是在他这个领域掌握了丰富知识的研究者。没有深入的研究，哪来生动的普及？王伯祥、余冠英、钱锺书等人的学术普及工作就是成功的典范。对学者而言，深入易，浅出难。浅出所以难，是对作者要求高，他必须真正读懂经典作品，才不至于把经念歪。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，专注于某一学术领域，遇到不懂的地方，偷懒的办法就是绕过去，而要讲给大众听，就无法藏拙。因此，做好普及工作，仅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积学储宝、研阅穷照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普及工作才会更有实效，也才会更有意义。

启示之三，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，其意义还不仅仅是传播文化知识，更是传递一种理念，一种理想，甚至还可以说，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。大家都认同这样的观点，即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和灵魂。一个不知本来的民族，是绝对没有未来的希望的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，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显得尤为重要。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，物质文化可以全球化，而精神文化却有其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。文学研究工作者，有必要深入总结我们民族的传统特性和现实追求，并把这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固化为人民大众的行为准则和共同梦想。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，将会永久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由上述几点启示来看，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这套

“古代诗词典藏本”，恰逢其时，其意义自不必多说。编者的态度是认真的，他们以“阐释经典本身也要成为经典”为追求，其选家皆术有专攻，在其所选评方面具有相当的专精研究与学术影响，从而保证了选本的专业性与权威性。

正是由于每位选注者的研究领域、研究特点不同，因此“古代诗词典藏本”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强求整套丛书风格整齐划一，而允许一选本有一选本之个性特色。这里仅举数例：李山教授的《诗经选》，仿佛带领读者做了一次重回“诗经世界”的新旅——重新审读其字句、篇章，重新考订其创作年代，勾勒其礼乐背景，体味其文化意蕴，欣赏其风雅艺术，考察其歌唱方式……《王维诗选》的作者王志清教授认为，王维诗乃诗之哲学，亦可谓哲学之诗。故其选评，敏于感悟，精于赏玩；其评赏文字，巧于切入，工于辞采。《李清照诗词选》的作者陈祖美先生，在历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更贴近窥见了李清照的种种内心隐秘，从而细绎出易安的十余种“心事”——幼年失恃、党争株连、婕妤之叹，以及终生无嗣的庄姜之悲等等，提出了许多新人耳目的独到见解。

无须赘言，只这几本书的简略介绍，即已充分显示出选注者的学术个性。在大的统一的原则下，保留各个选本自己独特的面孔，这一点，近于文学所编写经典读本的传统。钱锺书先生的《宋诗选注》，就特别强调自己“注”的特色，而与其他选本略有不同。希望这种不拘一格、力避匠气的文风与学风，贯彻丛书始终，从而涌现出更多的既拥有学术品位又文采斐然，既不乏前沿理论、自出己见又深入浅出

的精品选本。

丛书付梓在即，编者希望我就上述特色发表感想，以便让更多的读者理解，这种信任让我感动。确实，好书好序，相得益彰。如果翻开一部新书，上来就是一篇乏味的序言，就好像刚出门，便遇上障碍物，诚可谓“出门即有碍，谁谓天地宽”，叫人眉蹙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早就告诫：“凡书有所发明，序可也；无所发明，但纪成书之岁可也。人之患在好为人序。”贸然作序，对读者可能会是一种冒犯。但我想，好书确实需要介绍，好意也要有所表达。我真诚地呼吁我们的同行，在努力攀登学术高峰的同时，不要忘记为社会尽些心力，为国家文化建设奉献我们的绵薄之力。

六十年前，文学研究所推出的经典读本，以著者自己研究为基础，广泛借鉴吸收前人成果，取得空前成就，影响至今。我们相信，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这套“古代诗词典藏本”，也一定能在学术普及工作方面推陈出新，为广大读者所认可。

2014年5月30日

草于京城爱吾庐

导 言

诗词，是诗人从心底里流出的生命体验。每家的诗词，都有独特的生命内涵。要了解词作的独特性，先须了解词人的独特性。想要深入领会辛弃疾的词，必须先了解辛弃疾其人。

一、英雄人

辛弃疾为人最突出的特点，是具有英雄气质。他不止一次地自称为英雄、自诩为英雄。他狂放的时候，感“叹少年胸襟，忒煞英雄。把黄英红萼，甚物堪同。除非腰佩黄金印，座中拥、红粉娇容”（《金菊对芙蓉》）。失意的时候，想“唤取红巾翠袖，搵英雄泪”（《水龙吟》）。老了，自伤“不念英雄江左老，用之可以尊中国”（《满江红》），“谁念英雄老矣，不道功名蕞尔，决策尚悠悠”（《水调歌头》）。

辛弃疾天生一副英雄模样，身材肥胖魁梧，壮健如虎，红颊青眼，目光有棱，眼睛一瞪，就光芒直射，威严冷峻。挚友陈亮题赞他的画像时，说他“眼光有棱，足以映照一世之豪”（《辛稼轩画像赞》）。词友刘过写诗赞扬辛弃疾，说“精神此老健如虎，红颊白须双眼青”（《呈稼轩》）。

辛弃疾究竟算不算英雄？我们先看古人心目中英雄的标准。三国时代刘劭《人物志》卷八《英雄》是这样定义英雄的：

夫草之精秀者为英，兽之特群者为雄。故人之文武茂异，取名于此。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，胆力过人谓之雄。……夫聪明者，英之分也，不得雄之胆，则说不行。胆力者，雄之分也，不得英之智，则事不立。是故英以其聪谋始，以其明见机，待雄之胆行之。雄以其力服众，以其勇排难，待英之智成之，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。若聪能谋始，而明不见机，乃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。聪能谋始，明能见机，而勇不能行，可以为循常而不可以虑变。若力能过人，而勇不能行，可以为力人，未可以为先登。力能过人，勇能行之，而智不能断事，可以为先登，未足以为将帅。必聪能谋始，明能见机，胆能决之，然后可以为英。张良是也。气力过人，勇能行之，智足断事，乃可以为雄。韩信是也。

这段话的大意是说，草中精秀出众的叫英，兽中特别超群的叫雄。所以人们把文武出众的人与之类比，将智慧超群的称为英，胆力过人的称为雄。英有聪明智慧，但如果没有雄的胆量，他的理想就没法实现。雄有胆略武力，但如果没有英的智慧，也难以成就事业。所以，英以他的智慧做出战略部署、并能把握战略机遇，还需要雄的胆量来付

诸行动。雄有过人的力量来服众，超常的勇气排除困难，但需要英的智慧来成就事业。英和雄各济所长，才能成就伟业。如果只有远见谋略，而不善于把握战机，这种人只能坐而论道，而不能实战。有远见谋略，又能把握战略机遇，但如果没有勇气付出行动，这种人只能守常规而不能随机应变，不能解决突发的危机。如果力量过人，但没有勇气行动，只能做力士，而不能冲锋陷阵。力量过人，勇于冲锋陷阵，但如果智慧不足以临机断事，这种人可以为先锋，而难以做将帅。称得上是英的人，一定是有远见谋略，善于掌控战机，而且有胆量做出决断，并能付诸行动。张良就是这样的人。称得上是雄的，必定是武力过人，勇敢无畏，有行动力，而且临事机智果断。韩信就是典范。

综合来看，英雄的特点是聪能谋始，明能见机，胆能决之，勇能行之，气力过人，智足断事。辛弃疾就是这样的英雄。且看他青壮年时代的几件壮举：

1. 年少从军

人们都知道，二十二岁时，辛弃疾曾聚众二千，起兵抗金，后投奔耿京部下，为掌书记。他在《美芹十论》中说：“辛巳岁，金亮南下。中原之民屯聚蜂起，臣尝鸠众二千，隶耿京为掌书记。”辛巳岁，即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）。我们要追问的是，他为什么要起兵抗金，起兵的动机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要率两千人投奔耿京部下，而不是只身前往？或者说他为什么要隶属于耿京部下，而不是自立山头，独立抗战？为什么偏偏是在绍兴三十一年辛巳

(1161)起兵，而不是在此前或此后起兵？

辛弃疾起兵是为民族大义，而不是做绿林好汉。辛弃疾的家乡在济南，他自幼生长在金人占领区，饱受民族压迫与欺凌。《美芹十论·观衅篇》说：当时胡人“分朋植党，仇灭中华。民有不平，讼之于官，则胡人胜，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；田畴相邻，胡人则强而夺之；孳畜相杂，胡人则盗而有之”。所以，他从小就立志要为民族报仇雪耻，所谓“虏人凭陵中夏，臣子思酬国耻，普天率土，此心未尝一日忘”（《美芹十论》）。

他起兵抗战的动机是雪洗国耻，收复中原。既然起兵抗战是为收复中原，如果孤军奋战，自不可能成功，必须壮大力量，团结义士，共图大业。对此，他在《美芹十论》中说得很明白：“隶耿京为掌书记，与图恢复，共籍兵二十五万。”辛弃疾不自立山头单干，而要投奔耿京的队伍，目的是共“图恢复”大计。

辛弃疾率众两千投奔耿京，而不是只身前往，这体现出辛弃疾的“聪能谋始”。试想，当时辛弃疾年方二十出头，一个毛头小伙，如果只身前往，短期内必然难以获得耿京的信任重用。带上两千人的队伍投奔，陡然间就壮大了耿京队伍的实力，耿京自然会对辛弃疾刮目相看，而委以重任。

且看耿京是如何逐步壮大的。据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二百四十九记载：济南人耿京怨恨金人的横征暴敛，民不聊生，才揭竿而起。先是结集李铁枪等六人入东山，逐渐发展到数十人，攻取莱芜、泰安后，队伍扩展到百余

人。莱州贾瑞带领数十人归耿京，耿京大喜。耿京听从贾瑞的建议，将百余名部下分为诸军，各令招人，不久，就招募到了数十万人。辛弃疾带领两千人归隶耿京，耿京自然是大喜过望。率众两千入伙，等于是“投名状”，有了这个资本，辛弃疾在耿京的队伍中就能迅速受到重视，得到重用，才有可能“与图恢复”，实现他远大的战略意图。所以，辛弃疾率众两千投奔耿京，是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，是他实现“恢复”大业的第一步。

辛弃疾之所以在绍兴三十一年冬天起兵，而不是在这之前或之后，是因为其时金主完颜亮率领百万大军南下侵宋，北方兵力空虚。加之完颜亮南侵前，向中原民众预征五年的租税，致使民怨沸腾，民不聊生，中原豪杰，如河北大名的王友直、山东济南的耿京、太行山的陈俊，倡议集众，并起反抗。辛弃疾敏锐地抓住这个难得的战略机遇，趁机而起，聚兵反抗。辛弃疾曾说“思投衅而起，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”（《美芹十论》），所谓“投衅而起”，就是寻找机会起兵反抗。

辛弃疾在《美芹十论·观衅》中曾分析过北方民众适时群起反金的原因：深受民族压迫的中原之民，此前不敢贸然起兵抗金，主要是习惯了苟且偷安，又惧怕金人的诛杀之威。之所以到绍兴三十一年辛巳纷纷揭竿而起，是因为“怨已深，痛已巨，而怒已盈”。只可惜当时南宋朝廷没有抓住这难得的机遇。如果南宋朝廷当年能把握这个机遇，与北方义兵相互声援，南北呼应，或者可一举而定中原。

很显然，辛弃疾在绍兴三十一年起兵，正是看到了中原的人心对金人已怨恨至极，此时举义旗，聚义兵，容易得到民众的响应。趁金兵主力南下时举兵，金朝也无力顾及，义兵容易立足生存，也容易发展壮大。辛弃疾的“明能见机”，“勇能行之”，于斯可见。

2. 追杀义端

辛弃疾任耿京的掌书记后，遇到一突发事件，差点丢掉性命，但他以雷霆手段处置，转危为安。《宋史·辛弃疾传》记载这件事的原委是：辛弃疾归耿京之后，曾劝说一位义兵头领义端和尚带领千余人归顺耿京部下。不想这义端为人不义，行为不端，是个投机分子。参与耿京的队伍不久，他就盗窃辛弃疾掌管的军印潜逃。耿京大怒，要杀辛弃疾。辛弃疾说：“请给我三天期限，抓不到义端，再来就死不迟。”辛弃疾料定义端是叛逃至金兵军营，把掌握的军事情报献给金帅，以博取个人利益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辛弃疾很快就追上了义端，义端见辛弃疾追来，求饶说：“我识君真相，乃青兕也，力能杀人，幸勿杀我。”辛弃疾毫不手软，果断地斩其首级，夺回军印。耿京自此更加信任辛弃疾。

辛弃疾能料定义端是叛投金军，表明辛弃疾判断力强，料事如神。义端逃跑之后，他能追上义端并活捉生擒，表明辛弃疾“气力过人”且“勇能行之”。义端喜谈兵，又能聚众千余人，自非等闲之辈。而他见辛弃疾追来就恐惧不已，说辛弃疾的前身是犀牛，足见辛弃疾力大无比，他毫不留情地杀死叛徒义端，足见他行事果敢。

3. 决策南向

辛弃疾任耿京掌书记数月之后，就向耿京献策，把队伍拉到南宋，图谋发展。这就是《宋史·辛弃疾传》里说的“劝京决策南向”。《美芹十论》里也说：“隶耿京为掌书记，与图恢复，共籍兵二十五万，纳款于朝。”所谓“决策南向”，“纳款于朝”，是说要带领二十万五兵马，投诚南宋王朝。

为什么辛弃疾要劝耿京“决策南向”？他是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？

原来，绍兴三十一年冬天完颜亮南侵渡淮不久，就被部下杀死。金兵主力部队全部撤回北方，这对义军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。更为严峻的，金世宗继位后，对北方义军采取了攻心瓦解的策略，下令“在山者为盗贼，下山者为良民”，“放罪”赦免抗金义军。于是北方义军人心涣散，大多解甲归田，不少义军队伍随即土崩瓦解。如王友直部，原有众数十万，自从金世宗下达归农为民的赦令后，只剩下三十多人。因无法生存，王友直只好率三十多名部下南奔投诚南宋。

王友直部队瓦解之后，耿京部队自然是独木难支。如果不及时另寻出路，也很快会像王友直部队一样溃散，或被金兵消灭。所以，辛弃疾劝耿京“决策南向”，而耿京也言听计从，采纳了辛弃疾的建议。一个二十三岁的少年，敏锐地察觉到部队的生存危机，为二十五万的军队寻找出路，辛弃疾的“聪能谋始，明能见机”，再一次得到充分的展现。

4. 生擒叛将

耿京听从辛弃疾南下投诚的计策后，即委派贾瑞和辛弃疾等十一人前往南宋接洽。贾瑞、辛弃疾一行从山东东平出发，于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）正月到达楚州（今江苏淮阴），在淮南转运副使杨抗的安排下，前往建康（今南京）。正月十八日，宋高宗赵构巡幸至建康，闻辛弃疾一行南来，大喜，随即召见，并分别授予官职，耿京部下有二百多人被授官。贾瑞、辛弃疾一行接受任命之后，即返回山东。枢密院委派使臣吴革、李彪二人携带官诰文书随贾瑞、辛弃疾等一同前往，准备到山东当面宣布朝廷的任命。到达海州（今江苏连云港）后，京东招讨使李宝又派部将王世隆率十数名骑兵护送贾瑞、辛弃疾一行。

就在辛弃疾等人准备离开海州前往山东时，原来的部下马全福前来报讯，说耿京被叛将张安国杀害，义兵队伍已经溃散，张安国率部投降了金人。辛弃疾闻讯大惊，立机立断，与王世隆及马全福等相约潜回山东，生擒张安国。将张安国活捉生擒之后，送往临安正法。史载：

绍兴三十二年，京令弃疾奉表归宋，高宗劳师建康，召见，嘉纳之，授承务郎、天平节度掌书记，并以节使印告召京。会张安国、邵进已杀京降金，弃疾还至海州，与众谋曰：“我缘主帅来归朝，不期事变，何以复命？”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，安国方与金将酣饮，即众中缚之以归，金将